

顾问 李君如

民族复兴的 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读本



湖南教育出版社

民族复兴的 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读本

本书编写组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民族复兴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读本/李君如主编。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5
ISBN 7-5355

I. 民… II. 李… III. 中国共产党 - 党史 - 普及读物
IV. D2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27091 号

民族复兴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读本
李君如 主编
责任编辑：杨新援 祁光禄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 643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 开 印张：10.5 字数：270000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5355—3395—7/G·3390
定 价：16.5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人类进入了21世纪，我们党也将迎来80周年诞辰。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历史进程中，进一步发挥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重要问题。为此，就要深入研究党的建设的理论，并把这样的研究同今天党所面临的新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回答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实际问题，推动党的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今天，我们研究党建问题，有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这就是江泽民总书记在2000年2月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思想，它使我们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总纲、一个基本方针。我们在报刊杂志上，可以经常读到这样的话：“三个代表”思想是为了解决在新世纪我们“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问题提出来的，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我们党面向新世纪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这是对的。

现在的问题是，对“三个代表”思想的学习，不能停留在一般性的理解和认识上，而是要紧密联系当前党的建设的实际，深化对这一重要思想的学习和研究。那么，怎么深化呢？

第一，要全面正确地学习领会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

大家知道，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后，又在江苏、浙江、上海三省市党建座谈会上，在西北五省区党建和西部大开发的座谈会上，在东北党建座谈会上，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和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在十五届五中全会和2001年初召开的

中央工作会议上，反复阐述了这一重要思想。江泽民总书记在这些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是我们全面正确地学习领会“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文献。

在这些重要的讲话里，江泽民总书记是怎样阐述“三个代表”思想的呢？

——他强调，“三个代表”是我们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总书记说过：“这‘三个代表’的要求，是根据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经验、现实需要提出来的，也是为了在新时期新的实践中更好地全面落实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要求提出来的，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我们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这是一个重要的定位。

——他强调，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面对发展的时代和变化的形势，使我们党能够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是江泽民总书记在西北五省区党建座谈会提出的。

——他强调，“三个代表”思想的精神实质，是使党走在时代的前列，永葆党的先进性。江泽民总书记说：“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这就是要求我们在风云变幻的复杂情况下，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

——他强调，提出“三个代表”的任务和目的，是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全党要围绕这个题目，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我国生产力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紧密结合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调查研究，形成共识，作出回答。”五中全会前，他还亲

自深入各地调查研究党建问题。在2001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再次指出：“关键问题是，进入新世纪，我们党应该怎样更好地肩负起推进改革和建设的历史使命，继续带领人民前进。因此应全面抓一抓党的建设，力争在这两年中取得新的明显成效，为开好十六大，开创改革和建设的新局面，创造良好条件。”他提出，要经过今年建党80周年、十五届六中全会，到明年十六大，形成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较为完整的思路。

——他强调，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进理论创新。江泽民总书记在江苏、浙江、上海三省市和西北五省区党建座谈会上反复提出这一问题。这是推进当前党建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的重要方针。因此，“我们开展各项工作，都要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看看我们所采取的措施、所做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符合的就毫不动摇地坚持，不符合的就勇于实事求是地纠正”。

第二，要深入研究党的建设的历史、现状和理论。

党的理论工作要始终不渝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就要深入地研究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经验，要深入地研究现状，包括中国的实际和面临的时代进步的潮流，要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并且把这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上的历史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她在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诸方面有独特的成功的经验，包括在执政党的执政方式上也有很好的经验。我们一定要十分珍惜这份宝贵的财富。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现状，应该看到，当前，我们的党已经发生了或者说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特别是，联系着时代的变化，我们党正面临着三大挑战和考验：一是执政的挑战和考验。这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对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能力的挑战和考验；另一方面是权力对党的侵蚀的挑战和考验。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

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对我们党的挑战和考验。这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是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党对这种新经济的正确领导；另一方面是如何经受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体制尚未完善之前各种消极、腐败因素对党的侵蚀。三是对外开放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对我们党的挑战和考验。这同样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如何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背景下建设党，包括加入WTO后党的执政方式、领导方式如何适应国际惯例；另一方面是如何在对外开放中防止“西化”、“分化”和意识形态渗透。

我们要紧密结合这样的历史和现状，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研究和创新，形成新时期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新思路。

第三，要加强执政党理论的研究。

我们今天讲党的建设，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的，这就是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我们讲要使党立于不败之地，也是指不能使党失去政权，丢掉执政的地位。

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就要研究执政党的理论。这是我们过去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邓小平在80年代就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讲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际上研究的是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的问题。

执政党在党的性质上没有改变，但地位和作用确实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此而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比如，在政治理念上，执政党必须树立党的执政意识，为人民掌握权力的意识；在党的纲领和奋斗目标上，执政党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把理想与现实统一起来，致力于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党的工作任务上，执政党必须把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同时努力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在党的领导方式上，执政党必须坚持把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依法治国统一

起来；在党的社会基础问题上，执政党必须兼顾各方面的利益要求，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在党的行为方式上，执政党要善于运用国家机器，开展对敌斗争，协调社会矛盾；在风险问题上，执政党要有抵御风险的意识和能力，特别是要有抵御权力对党侵蚀而导致腐败蔓延的机制和能力等等。当然，执政党和没有执政的党究竟有哪些区别，还需要加强研究。这里还不能说讲全了。

总之，我们通过深入学习“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在全面正确领会这一重要思想的过程中，认真调查研究，并在实践中去探索和创新，以改革的精神来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我们就能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党建思路。

上述这篇话，是我今年2月在广东省茂名市召开的一次学习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提纲，现作为序言奉献给大家。提供给读者的这本书，是一批年轻学者开展党建理论研究的一个有益尝试，尽管这种尝试是初步的，但还是有益的。

李君如

2001年4月17日
于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必然性	1
一 双重危机下的近代中国	1
二 艰难曲折的探索之路	10
三 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与发展	19
四 五四时期的抉择	25
五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	40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必然性	43
一 近代中国人对政党政治的认识与实践	43
二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历史形成	56
三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理论基础	66
四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80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106
一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邓小平理论	106
二 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	114
三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科学体系	130
四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特征	135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	143
一	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	143
二	新型制度的确立	151
三	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	161
四	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174
五	国际地位的提高和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	179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与建设中的历史经验	185
一	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我们的事业胜利前进的 根本保证	185
二	一切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	204
三	必须全面、正确、积极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路线	214
四	必须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	220
五	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222
六	必须建立和完善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制度和经 济体制	223
七	必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224
八	必须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	226
九	必须维护和保持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正确处理 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227
十	必须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 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	228
十一	必须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改革 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	229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精神	231
一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231

二	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	237
三	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无畏精神	243
四	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牺牲精神	245
五	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集体精神	252
六	中国共产党基本精神的特征	258
第七章	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建设中国共产党	269
一	“三个代表”是面向新世纪的必然抉择	269
二	“三个代表”思想的基本内涵	276
三	“三个代表”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282
四	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	287
结语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	300
后记		322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必然性

一 双重危机下的近代中国

19世纪以前，中国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特别是康乾盛世，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辉煌，而其时英国的工业革命还刚刚起步。中国的强大和富饶，吸引了欧洲各国的商人纷纷来华从事贸易，其中茶叶贸易是最大的贸易，以致人们将18世纪称为欧亚贸易的“茶叶世纪”。而欧洲各国因生产工艺较为落后，没有多少先进的商品能够吸引中国，因而它们在中欧贸易中多处于逆境地位，以致世界各地的白银经欧洲商人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形成了一个被称为“白银资本”的时代。^①英国是中欧贸易中最大的对华进口国，为了扭转贸易逆差，英国商人便从事罪恶的鸦片走私，并得到英国政府的鼓励和保护。从18世纪末叶起，大规模的卑鄙的鸦片走私在中国南部零丁洋海面上铺展开来。英国政府通过其殖民地印度对华进行鸦片走私贸易，纯粹是赤裸裸的殖民侵略。马克思指出：“殖民制度宣布，赚钱是人类最终的惟一的目的。”^②在英印

^① 参阅[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8页。

政府的收入中，“整整有七分之一是来自向中国人出售鸦片”^①。其实，英国政府的目的不在鸦片贸易本身，因为英国当时正处于疯狂的殖民扩张时期，它企图通过鸦片这把“利剑”推行它的殖民政策。对此马克思揭示出：“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②因而鸦片烟毒一旦蔓延中国，横披海内，其祸烈于洪水猛兽。漏厄不塞，足以贫民；吸食者众，足以弱种；吏治腐败，足以亡国。就在英国商人、毒贩大发不义之财时，中国的白银急剧外流。1800—1840年，估计约有3~4亿元的白银流入了英国鸦片商人的钱袋并间接充实了英国的国库。鸦片还毒害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腐蚀了清朝的官吏、军队。鸦片战争前，约有300万人包括大批官员、八旗和绿营兵丁成为离开烟灯就不能生存的瘾客君子。结果，清廷几乎陷入“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的困境。面对日趋严峻的形势，清政府从雍正九年即1731年便开始禁烟，经乾隆、嘉庆两朝，并于道光十九年即1839年掀起禁烟高潮。这一年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海滩亲自主持了销烟壮举，将一箱箱罪恶的鸦片用盐卤和石灰销毁，从销烟池倾入大海。“虎门销烟”引起了英国朝野的震惊，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这次战争由鸦片引起，所以被称为鸦片战争。从1840年6月开始，到1842年8月结束，结果是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1840年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屈辱与抗争、灾难与求索的近代。

（一）民族危机与救亡

自1840年以后，又发生了1857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在这些战争中，清王朝节节败退，侵略者步步进逼，他们占香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

港，下镇江，霸广州，占天津，火烧圆明园，血洗北京城，并在中国人的土地上挂起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持续近 2000 年的社会秩序就在这一系列浩劫中摇摇欲坠了。

外国侵略者通过这些战争以及数百个不平等条约和其他手段，大肆掠夺中国的领土，勒索中国的“赔款”，强占租界，攫取治外法权，取得在中国的土地上驻兵和开设银行、商行、工厂的特权，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交通线和海关，并且划分“势力范围”，进而操纵中国的内政，把中国推向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以领土为例，仅沙皇俄国就掠走了中国 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894 年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后，资产阶级革命家陈天华以沉痛的心情描述当时亡国灭种的态势：“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① 割地和赔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代中国主要赔款情况如下表^②：

条约名称	赔款数额
南京条约	2100 万银元
北京条约	1670 万两白银
天津条约	67 万两白银
伊犁条约	900 万户布，折合 3000 万两白银
马关条约	2.3 亿两白银
辛丑条约	4.5 亿两白银，本息折合 9.8 亿两白银
拉萨条约	50 万英镑
烟台条约	20 万两白银

① 陈天华：《猛回头》。

② 转引自李君如：《毛泽东与近代中国》，第 28 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

其中仅《辛丑条约》各项“赔款”总额便达10亿两白银，若按1911年中国的家庭户数计算，平均每户要承担11两白银，相当于当时鲁西北3~4亩的全年收获量，在河南每个家庭可买700斤左右的面粉。这些条约，就如另一种鸦片，把清政府财政吸食得形同枯槁，捉襟见肘，更是把中国人民压榨得奄奄一息，几陷绝境。

更为奇怪的是，作为国家主权重要标志的清政府海关，其最高行政职务——总税务司，竟一直由英国人李泰国、赫德掌握，后者一干就是46年。赫德利用总税务司职权，广泛干涉中国内政外交。1865年，他向清政府呈递一篇《局外旁观论》，“劝告”清政府忠实履行不平等条约，并威胁说，如果“违背条约，在万国公法准至用兵，败得必认旧约，赔补兵费，约外加保方止”。其强盗嘴脸斑斑若昭。更为荒唐的是，1868年，已经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蒲安臣竟敢擅自代表清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中美续增条约》（亦称《蒲安臣条约》），承认美国享有掠夺华工以及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学校的权利。这就是堂堂大清帝国的“外交”。结果晚清政治生活中形成了一个奇特的权力结构：帝国主义控制着总税务司，总税务司操纵着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主导着清政府的决策。

外国列强还在中国大地上制造了一幅幅惨绝人寰的、血与火的画图。一个在1840年7月参加过占领浙江定海县的英国军官记录了英军的暴行：

“军队登了陆，英国旗就展开。从这一分钟起，可怕的抢劫光景就呈现在眼前。暴力闯入每一幢房子，劫掠每一只箱匣，街道上堆满了国画、椅子、桌子、用具、谷粒……一切这些都被拾去，除了死尸以及被我们无情的火炮弄残废了的受伤者。”^①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将经过洗劫和焚烧的圆明园以及香

^① 转引自李文海、匡继光主编：《世纪噩梦》（上），第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山、玉泉山、万寿山等处的楼亭殿阁付之一炬。延续了整整数天的大火，使清廷经营了 150 多年的万园之园化为灰烬。令人发指的日本侵略者，在 1894 年 11 月 22 日攻入旅顺后，整整 4 天，不分男女老幼，见人便杀，结果全城只留下 36 名居民，背着“此人不可杀戮”的标签，在侵略者的枪口下，被逼着将死难同胞的尸骸抬到城外火化。尸体足足抬了一个月，火焚十几天才化为灰烬。

1900 年，八国联军将晚清年间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暴行推向了巅峰。北京 2700 多座大小寺庙被焚毁，繁华帝京在大火中变成了瓦砾场。侵略者更是杀人成性。据俄国人记载，各国使馆的官员竟以“杀人为乐”，他们“挥动着武器”，“以杀人数目来炫耀一人”。^① 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到处是死尸，无人掩埋，任凭野狗撕啃。

以上表明，在西方侵略者的蹂躏下，近代中国确实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中华民族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难怪乎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发出了中国“正处于东狼西虎、南弓北矢的时代，正是千钧一发，呼吸存亡”的时刻。难怪乎清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而彻底堕落成“洋人的朝廷”后，资产阶级革命者发出了“危乎！危乎！今日之时代，帝国主义最发达之时代也”的惊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已把中国推上了亡国之途。救亡图存，自然成了近代中国时代主题。

在西方列强的枪炮声中，中国人再也坐不住了，安不下心了，民族危机意识和爱国意识不断被催醒。以甲午战争为转折，中国人彻底从天朝上国、华夷之辨的传统民族国家观中苏醒，认识到中华民族只是世界各族的一员，并且面临着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规律所淘汰的危险。近代中国人的新型爱国意识油然生起。包天笑，民国时期的小说家，其时还只是个 19 岁的秀才，在晚年

^① 科罗斯托维茨：《俄国在远东》，第 110 页，商务印书馆，1975 年版。

追忆说：“那个时候，中国和日本打起仗来了，而中国被打败了，这便是中日甲午之战了。割去了台湾之后，还要求各口通商，苏州也开了日本租界。这时候，潜藏在中国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发动起来。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为什么人家比我强，而我们比人弱？为什么被挫于一个小小的日本国呢？读书人除了八股八韵之外，还有哪些他应该研究的学问呢？”^① 谭嗣同、章太炎也正是从此开始了艰难而痛苦的思想转轨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一批近代知识分子的雏形便在甲午战争的刺激下造就了。到1894年，孙中山便喊出了“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

中国人近代民族国家观的产生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过程，因而外国侵略者始终未能实现其彻底瓜分中国的梦想。特别是义和团运动所显示的中国人民敢于同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使帝国主义分子彻底认识到，要瓜分“地广土广，民气强劲”、“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的中国是不易实现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更是感叹道：“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再加上侵略者之间的勾心斗角，帝国主义不得不采取“以华治华”的策略。这样，中国仍维持着形式上的独立。但实际上，中国已沦为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其代理人进行间接地共同统治的半殖民地。

（二）社会危机与发展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又逐步地破坏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就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

^① 转引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第1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